

《東華漢學》第 29 期；301-33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9 年 6 月

【學苑春秋】  
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人華文文學  
——中國大陸學界對華語語系文學  
( Sinophone literature ) 主張的肯定與批判

金惠俊\*

【摘要】

大陸學界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大多不關心或不理睬，但是在大體觀望的氛圍裡有一部分學者還表現出關心的態度。大陸學界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的提出，在展示新的學術視角、使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論、提供跨國研究視野、構建國際研究領域、推動世界學術話語的產生等方面給予了肯定。但是在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內容上卻作出了批判。大陸學者對史書美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華語語系族群（或者華人）與中國的二元對立關係上的反離散論和反中國論，內部殖民主義主張和定居殖民主義主張，以及與其相關的華語語系概念和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大陸學者批判她的主張是要將大陸與臺灣分離的分離主義者的主張，她的思維方式是冷戰時期的思維方式。大陸學者不僅針對史書美所主張的基本觀點而且

---

\* [韓國]釜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對其理論敘述也進行了批判。他們主要批評她將後殖民理論或少數文學理論等西方學術界的一部分理論簡單套用或誤用在中國和華人的問題上。這些批判不能全盤否定、但是我認為也不乏牽強之處。

大陸學者幾乎沒有對王德威的主張和理論做專門的批判。這也許是因為王德威的學術地位和溫和語氣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還是主要因為王德威的見解與大陸學者有很多相似之處，正如王德威所說兩者之間完全可以對話。不過並非完全沒有批判王德威的論述，比如大陸學者們批評他把「Sinophone」譯成「華語語系」是犯了學術性錯誤。大陸學者仍然懷疑王德威也可能同樣以為大陸壓迫內部的華語語系族群（少數種族及與國家主義相錯位的群體），霸權性地對待外部的華語語系族群。

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除了在政治立場上的不同以外，在文學見解上也有諸多頗大的不同。其中決定性的不同就在於看待中國文學（中國大陸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的觀點上。大陸學界雖然不像過去那麼嚴重，但仍然保持著中國中心主義（或大陸中心主義）視角。相反，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則認為華語語系文學各自具有獨立性和獨自性，追究起來是與中國文學（或大陸文學）毫無相關的存在，或者至少是與大陸文學具有同等資格的存在。對中國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範疇上的區分也許最能體現出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的差異。

但是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存在著不能忽視的共同點或相似點。兩者都重視所謂漢語（華語）這一語言要素，執著於解釋華語語系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的關係。問題是不管他們各自的立場與意圖如何，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可能超越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或者作為歷史文化存在的中國，製造出一個作為巨大的新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大中華」。

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不能忽視既是他們自身已經提出的方案，又是大陸學者在批判他們的過程中提出的意見。要擺脫只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運用在探究與中國的關係上，也應該積極地適用在與居住地

的關係以及與西方中心主義的關係上，尤其應該積極探討與跨國移居者文學的相關性。如果這樣，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就可以作為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學界主流話語的批判理論，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關鍵詞：**華語語系、華語語系文學、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中國大陸文學、華人華文文學

## 一、華語語系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

2004年，UCLA的史書美教授提出了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接着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積極響應，並將其推動為學界的重要議題。在隨後10多年的時間裡，華語語系文學主張以兩位學者為中心，逐漸擴散到北美華人學界，甚至台灣學界、香港學界、馬來西亞華人學界等。<sup>1</sup>

他們認為漢語／華語（*Chinese*）原本不是單一的一種語言，而是多種語言的集合體。所謂「華語語系」是指那樣的各種漢語／華語或者使用它的人。換句話說，是與單一概念的漢語（或者國語／普通話等標準漢語）相對立的、集合概念的漢語／華語或者使用它的群體。<sup>2</sup>同樣的道理，「華語語系文學」就是指使用那樣的各種漢語／華語創作的文學。這些主張從表面上看單純是以語言學判斷為其出發點。但實際卻針對中國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乃至中國中心主義，提出了散在於世界各地的（中國內外部的）「華語語系群體」的「發聲」問題。這一點如果參考華語語系文學的定義以及其變化就可以容易了解到。最初，史書美為華語語系文學所下的定義：是指中國大陸之外地區，說華語的人，用華文創作的文學。後來隨着王德威的參與，大陸內部不以漢語作為母語的人（少數種族）創作的文學，也包括在華語語系文學之內。<sup>3</sup>

<sup>1</sup> 以下關於史書美與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主張是在綜合考察參考中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的觀點。因此屬於直接引用等的情況時具體標明出處，其餘省略。如果了解有關兩位主張的更詳細內容，請參考金惠俊，〈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境界的解體或再確立〉[韓語]，《中國現代文學》第80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17），頁73-105。

<sup>2</sup> 他們大體將集合概念的各種漢語稱為「華語」，與單一概念的「漢語」相區別。

<sup>3</sup> 王德威在〈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等裡暗中表示是否應該將以下幾種文學也包括在華語語系文學之內。第一，除了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漢語文學以外的各種聲音的漢語文學。第二，中國大陸以

他們的這些主張與大陸學界出於完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中國大陸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地華人使用華文創作的文學）。不僅如此，這實際上是試圖再構中文文學（或者漢語文學、華文文學）的版圖與系譜，更進一步說這是與大陸學界競爭有關中國問題的話語權。當然大陸學界不能輕易無視或回避這些主張。因為19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參考和吸收了華人學界的各種觀點，隨之華人學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sup>4</sup>

大陸學界自從1980年代中期確定1997年香港回歸問題以來開始關心香港文學，繼而這種關心又擴大到台灣文學、澳門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特別是1993年以後將中國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合在一起統稱為「世界華文文學」，建構了與既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相對照的新的學術領域。<sup>5</sup>但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界仍然在經受着眾多挑戰。世界華文文學這一用語，到底是否恰當地囊括對象，世界華文文學學界是否恰當地看待對象等等的疑問不斷被提出。另外，大陸學界內部對這一領域的漢

---

外說華語的華人用其他語言創作的「華人非華文文學」。第三，甚至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漢語文學。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2006.9），頁1-4。

<sup>4</sup> 典型的例子就是給1980年代大陸的「重寫文學史」現象帶來的影響。隨着華人學界影響力的增強，大陸甚至出現盲目模仿其主張和方法的現象。對此北京大學的溫儒敏等學者稱之為「漢學心態」，並表示擔憂。他們認為固然需要尊重、研究、引進海外漢學（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但是無條件地將其作為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標準是不行的。參考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2007.3），頁110-118、溫儒敏，〈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文藝爭鳴》2007年第7期（2007.7），頁51-55、楊俊蕾，〈「中心—邊緣」雙夢記：海外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的流散、離散敘述〉，《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4期（2010.10），頁89-98、畢紅霞，〈我們為何批評王德威——兼論面對「海外漢學」的複雜心態〉，《當代文壇》2013年第3期（2013.5），頁32-35等。

<sup>5</sup> 世界華文文學在理論上包括中國大陸的華文文學（即中國現當代文學），但是實際上卻不予言及。世界華文文學在大陸的正式學術體系中，屬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下級領域。甚至學界一直流傳一句玩笑：一流學者研究古代文學，二流學者研究現當代文學，三流學者研究港台文學。見〈我們為何批評王德威——兼論面對「海外漢學」的複雜心態〉，頁33、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1期（2014.2），頁19。

不關心，以及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懷疑，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華語語系文學主張，這其實等於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學術概念本身，或者以此為根基的學界的存立，提出疑問。

那麼大陸學界，特別是其中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界又是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如何應付呢？或者說做出哪些反應呢？大陸學界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評價是否妥當，是否合理呢？兩者之間存在何種異同，其意義如何，又有什麼問題呢？

## 二、大陸學界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肯定

作為跨國移居者的華人總是被居住地懷疑其忠誠，特別是由於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所具有的經濟力與凝聚力就更是如此。這種情況到20世紀中期以後世界冷戰時期變得更加嚴重。一方面是由於各國牽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大陸）這一政治實體而對華人施加的壓力更為加重，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當時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刻意與華人保持距離，使得華人的根基更為減弱。當時，屬於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大陸為了擺脫在國際舞台上的外交孤立，促進與東南亞的友好關係，甚至為了避免各國的牽制而鼓勵華人取得當地國籍。因此東南亞的華人經受既被居住國歧視，同時也被他們所依賴的出發地拋棄的痛苦經歷。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1960年代中期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慘劇。在蘇哈托政權的反共政策與民族主義，以及中國大陸的迴避之下，當地幾萬華人就失去了生命與財產。<sup>6</sup>

近來這種情況再一次變得嚴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崛起」。一方面華人在居住地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居住地對華人的疑心，也再一

---

<sup>6</sup> 參考崔承現，〈現代「中國」與「華僑」的相互認識研究〉，《中國學論叢》第33號，韓國中國文化學會，2011，頁285-306。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又發生了類似的事件。

度加重。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改變了以前的態度，想盡辦法將華人重新納入影響力之下，試圖實行一種政治上的再民族化。華人在已經進行了數百年或數十年在地化的情況下，反復出現這種變動對他們來說無疑不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因此對華人來說當務之急是：清算過去的不安，確立政治和文化上的身份認同。就在此時史書美與王德威等提出華語語系文學，試圖通過華語語系群體、華語語系文化、華語語系表述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等等擴大研究範疇，再構華人與中國、華人與居住地的關係。

大陸學界對史書美、王德威等的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又有何種反應呢？根據相關論文的內容、語氣和其他事實來看，大多學者（也許有意）不關心或不理睬，但是在大體觀望的氛圍裡有一部分學者還表現出關心的態度。再說，王德威的很多著作不斷出版，他的學術成果常常被引用或提及，有關王德威與史書美等的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論文也經常出現，甚至有些研究雖然沒有直接言及，但暗中意識到華語語系文學主張。<sup>7</sup>只是到現在好像還沒有大陸學者全面肯定華語語系文學主張，並積極使用相關用語或概念。

大體上，大陸學界肯定華語語系文學主張者，可綜合概括為如下幾點。<sup>8</sup>第一，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積極表達華人的觀點，從而打破世界華文

<sup>7</sup> 到目前為止在大陸出版的王德威的著作達到 10 冊。此外，CNKI（中國知網）的哲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搜索結果，2017 年 1 月 21 日現在在大陸發表的相關文章的篇數如下。王德威刊載 96 篇，史書美刊載 2 篇，王德威主題 758 篇（碩士 53 篇，博士 11 篇），史書美主題 15 篇（博士 2 篇），華語語系文學主題 58 篇（碩士 3 篇）。其中一部分文章可能會有重複，但在了解大致的情況上不存在問題。

<sup>8</sup> 綜合參考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學術研究》2010 年第 7 期（2010.7），頁 146-152、160、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楊俊蕾，〈我們為何批評王德威——兼論面對「海外漢學」的複雜心態〉、曾軍，〈「華語語系學術」的生成及其問題〉，《當代作家評論》2012 年第 4 期（2012.7），頁 203-205、畢紅霞，〈我們為何批評王德威——兼論面對「海外漢學」的複雜心態〉、李鳳亮、胡平，〈「華語語系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待解的問題〉，《文藝理論研究》2013 年第 1 期（2013.1），頁 53-61，湯擁華，〈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揚子江評論》2014 年第 2 期

文學研究的單調的現狀。第二，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引入後殖民理論等跨學科的觀點，從而使大陸學界對熟悉的既有研究方法進行反思。第三，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強調世界各地華人群體的豐富的地域性，從而使大陸學界在跨國語境裡探討這一問題的複雜性。第四，華語語系文學主張通過將華人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放在全球網絡中考察，從而鞏固其地位並且使大陸學界的研究有可能走向國際化。第五，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反對離散理論，提出不是以國家而是以語言群體為單位的文學範疇，從而挑戰西方主流學界的話語主導權，並且打造一個轉機使他們自身及大陸學界由原來的消極態度向積極態度轉換。大陸學界最為肯定的是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對在地性（地域性、本土性）的強調。比如，朱崇科這樣說道：「華語語系文學背後強烈地呈現出對此華文文學本土性的有意強調，這也和筆者[朱崇科]的主張不謀而合：只有對各區域華文文學的本土性展開更深入的了解和切實的尊重，對話彼此借鑒，我們才因此可能建構和而不同的文學中華或其他。」<sup>9</sup>朱崇科甚至還使用「救贖」來表現大陸學界過去沒有準確把握華人華文文學的獨立性問題，試圖找尋可能的修補之道。<sup>10</sup>

只是華人學者所強調的在地性與大陸學者所重視的在地性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前者通過強調華語語系文學的在地性而批判中國中心主義，甚至懷疑乃至拒絕中國性。相反，後者通過尊重世界華文文學的在地性而反省中國中心主義，但仍然以中國性為核心，並認為應該繼續保持它。換句話說，前者在強調在地性的同時也要堅持眾聲喧嘩，而且其

---

（2014.4），頁 58-67、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文藝研究》2015 年第 11 期（2015.11），頁 51-60、彌沙，〈世界文學「觀念與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5 年第 4 期（2015.12），頁 94-98 等。

<sup>9</sup> 見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頁 148。湯擁華也說「她的着眼點都是『文學如何在地』。在理論研究的層面，我認為這才是史書美最值得注意的立場」。見〈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

<sup>10</sup> 見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頁 18。



中一部分學者更主張最終通過與中國（大陸）的決裂來實現徹底的在地化。相反，後者在尊重在地性的同時仍要保持它與中國（大陸）的親緣性，這就是說，最終要形成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華大同世界。

### 三、大陸學界對史書美主張的批判

如上所述，大陸學界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的提出，在展示新的學術視角、使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論、提供跨國研究視野、構建國際研究領域、推動世界學術話語的產生等方面給予了肯定。但是大陸學者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肯定大多只停留在原則性的水準上，相比之下更多的是具體的、詳細的、逐一的批判。這些批判大部分集中在史書美的觀點上，最主要是因為她展開所謂「反離散論」與「反中國論」。

史書美主張不該再從離散的觀點看待華人。<sup>11</sup>因為這種觀點使對華人的雙重支配——來自居住地國家的異質化與邊緣化以及來自出發地中國的同質化與邊緣化——得更加堅固。她主張華人擺脫這種狀態，確立身份認同的唯一途徑就是與中國斷絕關係，徹底實現在地化，並在其延長線上主張應該堅決反對來自中國的所有壓力。史書美認為今天的中國雖然與過去帝國主義時期的西方帝國不完全一樣，但是在很多方面對華人施加一種類似帝國主義式霸權性壓迫。她也認為過去移居到大陸以外地區的漢族群體對原住民實行一種定居殖民主義 (settler colonialism)，中國歷來對內部的華語語系群體（少數種族）實行內部殖民主義 (internal colonialism)。按照她的說法，台灣不僅與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大陸，甚至也與作為歷史文化存在的中國毫無相關，因此台灣獨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sup>11</sup> 見史書美，趙娟譯，〈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2011.12），頁5-14。

從大陸學者的立場來看，史書美的這些主張和理論是不能接受的。首先引起他們的反感很可能是她談論在歷史文化上中國的帝國主義特徵或者漢族的對外侵略性等問題。可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就反映存在於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以及散在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之間的現實政治。與中國的徹底決裂論所主張的不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希求——要散在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通過徹底的在地化獲得居住地的認同，這實際上是無異於主張臺灣的獨立，甚至潛在地主張香港的獨立與中國內部少數種族的獨立。因此，大陸學者對史書美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華語語系族群（或者華人）與中國的二元對立關係上的反離散論和反中國論，內部殖民主義主張和定居殖民主義主張，以及與其相關的華語語系概念和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大陸學者批判，她的主張是要將大陸與臺灣分離的分離主義者的主張，她的思維方式是冷戰時期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他們雖然承認大陸學界過去沒有充分考慮華人的立場，但是強調大陸學界或世界華文文學界如今已開始真正尊重華人和華人華文文學的獨立性並對其平等相待，同時他們繼而批判史書美對此情況完全無知或有意忽視。<sup>12</sup>

大陸學者不僅針對史書美所主張的基本觀點而且對其理論敘述也進行了批判。他們主要批評她將後殖民理論或少數文學理論等西方學術界的一部分理論簡單套用或誤用在中國和華人的問題上。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趙稀方對史書美的批判。趙稀方認為史書美是誤用後殖民主義理論。<sup>13</sup>史書美主張英語語系族群（Anglophones）受到來自西歐的殖民支配一樣，華語語系族群（Sinophones）也受到來自中國的殖民支配，但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合。中國沒有在國外實行過殖民行徑，華人主

<sup>12</sup> 主要參考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等。只是大陸學者如果太積極探討這個問題，那麼不能不談及大陸內部的西藏和新疆問題，也許出於此種原因，他們好像沒有再進一步提出更具體的批判。

<sup>13</sup> 見趙稀方，〈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文學〉，《北方論叢》2015年第2期（2015.3），頁31-35。

要是因為中國內部的戰亂為避難而移居國外，華人所面對的殖民主義者不是中國而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特別是香港受到的是英國的殖民支配。趙稀方又認為史書美在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問題上誤用霍米·巴巴的混雜概念。「海外華人文學」（即大陸外華語語系文學）的範疇不僅是流動的，而且是在整個中文文學的大框架裡與中國文學彼此相溶的，因此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並非是變形與嘲弄方式的反抗性混雜關係。趙稀方甚至還批判史書美也誤用德勒茲與瓜達利的少數文學理論。兩位學者所說的少數文學是指少數者使用主流社會的語言進行的創作，而史書美所主張的華語語系文學是華人使用華語的創作，因此華語語系文學相對於中國文學來說並不是少數文學。

趙稀方的這些批判不能全盤否定，但是我認為也不乏牽強之處。第一，史書美確實從與英語語系等等的相似性入手而提出華語語系，可是她已經表明西方的殖民主義與中國的殖民主義行為不完全相同，<sup>14</sup>而且她要強調的是，從現在的中國（大陸）與華語語系族群的關係上看，前者顯露出霸權主義傾向。第二，她確實利用內部殖民主義理論從殖民主義乃至後殖民主義角度分析大陸（或者漢族）與大陸內部少數種族的關係，但是對此問題能否采取完全否認的態度也是值得思考。第三，史書美確實在台灣問題上運用定居殖民主義理論，我們當然可以懷疑史書美的主張帶有原住民還原主義乃至原住民絕對主義的色彩，<sup>15</sup>但是從原住民的立場來看不是沒有可能將漢族看成是殖民主義者。甚至過去日本和外省人（或以國民黨政權為代表的中國）對於原住民和本省人，當今大陸（或以共產黨政權為代表的中國）對於整個台灣住民，也不是沒有可能被看作是壓抑性存在。

<sup>14</sup> 史書美曾說：「當代身在海外的華語語系族群，除了少數例子之外，很難說與中國有殖民或後殖民的關係。這是華語語系與其他以語言為劃分標準的後殖民社群，如西語語系、法語語系等等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見史書美，楊華慶譯，蔡建鑫校，《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54。

<sup>15</sup> 從人類悠久的歷史上來看我們都是移居者。那麼，果真是最先到達的人是原住民，他們就是這個地區的原主人嗎？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難道不是某個群體成為主流、中心，而使其他群體少數化、邊緣化嗎？

批判史書美在華語語系文學上對少數文學理論的誤用也是如此。德勒茲與瓜達利以卡夫卡為例將少數者用主流語言寫作的文學定義為少數文學。<sup>16</sup>但散在於世界各地的華人創作的文學，不管是使用主流語言的非華文文學還是使用華文的華文文學，都是表現少數者生活的文學。而且這種文學確實具有改變主流文學的、與主流文學一起創造新的文學的潛在力量。因此，我們可以說史書美非原封不動地而靈活地運用少數文學理論，但不能斷言這是誤用。若是這種德勒茲與瓜達利的寶貴的觀點不能得以積極發展，而只被無條件的絕對化，這才是不是真正成為問題？

在大陸學者的反應中從理論或邏輯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湯擁華的見解。他沒有直接指向史書美的政治見解而將計就計地利用她所敘述的理論和邏輯批判她。<sup>17</sup>他所批判的問題大致如下。第一，她雖然強烈反對來自居住地國家與出發地中國的雙重邊緣化，但是在展開論述時卻在積極利用這種邊緣地位。第二，她在理念上主張「中國」不過是在歷史中形成的虛構概念而加以否定，但在展開理論時卻承認這種在歷史中形成的中國。第三，她提出所謂華語語系的概念，強調思維方式的轉換，確信它的力量，但是實際上讓人不能不懷疑那種思維方式是否真正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第四，她用華語語系研究批判中國中心主義，但其所展開的理論本身就是來自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也許是她作為第三世界出身的學者為了確保自己在西方的地位而利用所謂第三世界的素材。

湯擁華的這些批判有其相當犀利的一面，只是對於他對史書美的分析乃至批判是否全都正確這還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史書美只是在以

<sup>16</sup> 史書美也很清楚這一點，她說：「也許華語語系的主流語言是標準漢語，……華語語系藉着挪用德勒茲與瓜達利『少數文學』的說法，實踐並成為一種『少數表述』，……中國境內的少數種族藉着使用標準漢語來融入中國性與中國民族性的儀式，正是華語表述的典型案例。而在中國境外也有抵抗中國統治的表述實踐。」見《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57。在這裡她使用「也許」一詞，這表示她認為中國與漢語各自只限於在華人與中國、華語語系與漢語的關係上成為華人與華語語系的主流。

<sup>17</sup> 見〈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頁 58-67。

所謂的作為中心的中國與作為邊緣的華語語系為前提，試圖在邊緣地帶的弱勢地位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而已。她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瓦解中心，從根本上製造一個沒有中心和邊緣的狀態。有關中國概念部分的爭議也值得商榷，據我瞭解，史書美以為「中國」概念是歷史上經歷了許多變遷之後而形成，因此今天將中國看作某種本質性或源泉性存在這不是正確的觀點，她就從這個角度來強調中國的虛構性，反對中國中心主義。換句話說，她不是說沒有中國概念本身和產生中國概念的特定現實，而是說，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分析的民族概念與特定現實的關係一樣，中國概念只不過是提取某些現象而想像出的存在而已，但大家將中國概念絕對化，問題就在這一點上。因此史書美拒絕源與流、根與枝的比喻<sup>18</sup>而想像由多種群體集合的華語語系族群也並不矛盾。她只是提出要拒絕本質的、總體的、不變的、作為中心的所謂中國，因為她認為有可能形成沒有中心的、同等的、眾聲喧嘩的、作為集合體的所謂華語語系族群。<sup>19</sup>

史書美從華語語系文學到華語語系研究提供了一個挑戰性的新視角而強調思維方式的轉換，不過最終是否能發展到認識論而改變現實這還不能斷言，我覺得即使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但是根據史書美的過去經歷和現在情況而批評她在為西方中心主義辯護，這很可能是誤解。<sup>20</sup>因為雖然她的具體實踐與她的個人意念相比顯得有些不足，但是她一直以來都在批

<sup>18</sup> 史書美、王德威等在此問題上都提出，要參考德勒茲與瓜達利的「根莖理論」(theory of rhizome)，或者斯圖爾特·霍爾的「根／徑」(roots and routes)的想法。只是史書美追求的是沒有中心的狀態，相反王德威則承認中國這一中心。

<sup>19</sup> 只是在我看來這種巨大的想像的共同體，在理論上是否合理，在現實上是否可能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sup>20</sup> 史書美是韓國華人出身，在韓國華僑學校畢業，赴台灣完成大學學業後又移居到美國。19世紀末以來大舉移居韓國的華人一般都在1945年以後都因為韓國強烈的國家主義而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其中再移居台灣的韓國華人在台灣也因為本省人與外省人而被邊緣化。另外，再移居美國的韓國華人也因為主流社會與既有的在美華人而被邊緣化，因此甚至韓國華人出身中的許多人並不在中國城生活而在韓國城生活。關於韓國華人的情況參考朴銀瓊，《韓國華僑的種族性》(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

判西方學術界的西方中心主義行為。因為她雖然能夠嫻熟地運用西方的學術理論，但是又在不斷地考慮中國的理論或者第三世界的理論的提示。<sup>21</sup>

#### 四、大陸學界對王德威主張的批判

在我看來，王德威的許多觀點基本上與史書美相同，但與史書美的情況不同，幾乎沒有大陸學者對王德威的主張和理論做專門的批判。這也許是因為王德威的學術地位和溫和語氣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還是主要因為王德威的見解與大陸學者有很多相似之處，正如王德威所說兩者之間完全可以對話。比如，史書美為了反抗雙重支配（雙重統合）主張在華語語系文學裡將中國「排除在外」，而王德威則主張適當利用中國資源將中國「包括在外」。史書美主張中國的內部殖民主義與定居殖民主義，但是王德威則認為從歷史文化角度看這種複雜關係不能這樣簡單理解。王德威對於華語語系和華語語系文學問題不像史書美那樣從政治地理角度去看，而提出了「後遺民論」與「勢的詩學」的觀點。<sup>22</sup>

王德威認為在華語語系文學中出現「後遺民」現象。華語語系群體就像迷戀亡國的遺民那樣懷念回不去的出發地，而且他們沒有就此而

---

<sup>21</sup> 實際上史書美自身也提到過此問題。她的主張如下：西方的批評理論與文化理論無視西方內部他者的立場，只談論外部的他者。比如亞洲研究中沒有來自亞洲的理論，並且認為亞洲沒有什麼理論，只將亞洲的現實或文本作為西方理論研究的對象。見“*Theory, Asia,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3, No. 4, Dec. 2010, pp. 466-467. 在這種情況下，活動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出身的離散學者應該自問是否在使用共謀、兩面、反抗等方式構建所謂的第一世界「理論」與第三世界「現實」框架上助了一臂之力。見“*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19, No. 1, Jan. 2004, p.22. 另外，應該追究所謂「西方的理論，亞洲的現實」這種方式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因此「作為方法的亞洲」，「作為方法的中國」，「作為方法的華語語系」的思考方式是有必要的。見“*Theory, Asia, Sinophone*”, p.482.

<sup>22</sup>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象：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12），頁11-38；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24期（2013.12），頁1-18。

止，各自在居住地為了確立自己的文化合法性而試圖對出發地進行想象地創造，即，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建構過去。王德威也主張對待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中國人與華人時，不應採取靜態的位置和立場，而應該重視動態的趨勢與契機。就是說，不應像以前那樣根據政治觀點從中心／邊緣、內／外等層面上去思考，今後需要從所謂「廣義的中國」概念出發，承認彼此的間隔與距離，進行對話與比較。

他一方面對大陸的大陸中心主義學者質疑，如果他們企圖主張「大中華主義」，那麼為何還無視或排斥華語語系文學？另一方面對史書美等華人學者號召，要跳脫離散的孤兒心理而利用中國資源。他甚至還乾脆在某處提出「廣義的中國」概念，承認「中國」是中心，只是強調華語語系族群的發聲，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在同等的地位上平等對話。<sup>23</sup>因此從大陸學者的立場看，他們沒有必要積極地去批評王德威的見解。

不過並非完全沒有批判王德威的論述，比如朱崇科、黃維樑等就批評他把「Sinophone」譯成「華語語系」是犯了學術性錯誤。<sup>24</sup>所謂「語系」原本是「family of languages」的意思，將其作為「Sinophone」的譯文在學術上不夠嚴謹，給人造成「華語語系」（即漢語）是由許多種語言構成的誤解。對此王德威在很多地方進行了辯解，因為「中文／漢語／華語／華文」等這些用語基本指涉漢語的同一性，或者因為這種成見已經形成，所以他為了強調多元性和異語性而選擇使用「華語語系」這一用語。<sup>25</sup>

<sup>23</sup> 他在一次訪談中這樣說過，「從更廣義的概念講，什麼是中國呢，什麼又是我所謂的台灣？這一類的問題還是應該放在歷史的情境再繼續地思辨。……我希望這個中國是一個有容乃大的中國，它是一個以大陸這個板塊為主的中國，但是它也可以延伸到海外，是一個華語世界的中國。」見苗綠，〈中文語境裡的「世界公民」——王德威教授訪談之二〉，《長城》2012年第7期（2012.7），頁176。

<sup>24</sup> 見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黃維樑，〈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2013.1），頁105-111。

<sup>25</sup> 比如他在與李鳳亮的對話中說，「華語語系」的「語系」其實比較接近於「family tree（系譜）」的觀念，為了強調使用華語社群的多樣性和所使用

即使王德威這樣辯解，但是大陸學者好像仍然沒有全面接受。他們批評史書美誤解漢語以及漢語的使用現狀，<sup>26</sup>這實際上也是在間接批判王德威。再說，漢語是由多種語言構成這一觀點本身就不能被大陸學者所接受。他們根本對於華語語系的學者立足於後殖民理論，把華語語系族群與英語語系族群等同看待極有反感。因此他們仍然懷疑王德威也可能同樣以為大陸壓迫內部的華語語系族群（少數種族及與國家主義相錯位的群體），霸權性地對待外部的華語語系族群。在此意義上，對華語語系文學主張比較懷有善意態度的劉俊的如下一段話相當耐人尋味：

應當說王德威是個有着大中華情懷的華人學者，然而他對大陸學界文學「國家主義」、「（大）中國中心」和「四海歸心」、「萬流歸宗」的判斷，其實與事實並不相符。在我看來，出現這種誤判並不是王德威缺乏專業上的認識能力，而是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導致他有意做這樣的概括。<sup>27</sup>

總之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大陸學者對王德威表現出不少友善的面貌，下面舉其中一例。大陸學者一直都在指責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問題之一就是長期只有理論沒有實踐，而劉俊卻高度評價王德威的《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他認為，這篇文章是沒有總在理論思辯上兜圈子而拿出具體實績的一個重要成果，王德威在這篇文章裡運用自己的後殖民觀點具體分析作品的同時，也通過這種工作給馬華文學走出中國性／馬國性的糾纏提供了可能，將馬華文學引向與世界文學的對話。<sup>28</sup>

---

語言的多樣性，同時也為了強調華語這個公分母而有意選擇這個詞。見李鳳亮，〈「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訪談錄〉，《花城》2008年第5期（2008.9），頁201。

<sup>26</sup> 比如朱崇科說：「稍微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就知道，大陸人純粹只講普通話的人口比例並不高，……方言負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普通話是規定以北京話為中心的官方語言，這種做法當然有……強化國民認同國家的訴求和便利性考慮，但更大的原因在於它是實踐的產物。」見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頁150。

<sup>27</sup> 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頁58。

<sup>28</sup> 見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



就像劉俊指出的那樣，從華語語系文學的提出到華語語系研究的擴展，以較快的速度進行，因此作為始發點的華語語系文學本身的相關事項就顯得比較疏忽。按照華語語系文學的觀點來挖掘和分析作品的情況也不是很多，連偶爾被作為例證的文學作品也只停留在介紹華語語系文學主張的正當性層面上。從這些情況來看王德威的實踐是的確相當有意義的。

因此從這個方面講，我們有必要回味一下湯擁華提問說：「華語語系這一概念，能為文學研究本身增加什麼？」<sup>29</sup>這句話的意思。在湯擁華看來華語語系文學學者與大陸學者的政治見解如何不同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不管怎樣大家總要考慮這個問題的提出在之前與之後的進展上給文學研究自身帶來了哪些積極影響。即，在文學文本本身的分析方法以及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思考層面上有何進展？

如前所述，史書美主張「華語語系」概念的提出將來不僅能夠導出研究方法的革新甚至可以升華到新的認識論上。但是湯擁華卻懷疑它能否給文學研究本身帶來像範式轉換一樣的某種革命性變化。綜上所述，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研究（或者華語語系研究）到底會在哪些方面具有可能性，怎樣將這些可能性現實化等等，還是需要進一步深思熟慮。

## 五、華語語系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

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除了在政治立場上的不同以外，在文學見解上也有諸多頗大的不同。其中決定性的不同就在於看待中國文學（中國大陸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澳門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的觀點上。大陸學界雖然不像過去那麼嚴重，但仍然保持着中國中心主義（或大陸中心主義）視角，因而試圖以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或者中國文

為中心〉。

<sup>29</sup> 湯擁華，〈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頁 64。

學的外部擴散的形式而招攬台灣、香港、澳門的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相反，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對此表示反對。他們主張，這些文學各自具有獨立性和獨自性，追究起來是與中國文學（或大陸文學）毫無相關的存在，或者至少是與大陸文學具有同等資格的存在。而且他們還將大陸的少數種族使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也包括在華語語系文學之內，就是說發出與中國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文學不同聲音的華語文學都應該屬於華語語系文學。甚至，王德威還乾脆從另一個層次出發提出了「廣義的中國文學」概念，暗中表示不僅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就連華人非華文文學也包括在內。正如下面表格所顯示，對中國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範疇上的區分也許最能體現出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的差異。<sup>30</sup>

表1：筆者、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大陸學者  
在中國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範疇上的區分

金惠俊	中國文學						華人文學（移居者文學）	
	大陸文學		臺灣文學		香港、澳門文學		華人華文文學	華人非華文文學
	漢族漢語文學	非漢族漢語文學	漢族漢語文學	非漢族漢語文學	回歸前漢語文學	回歸後漢語文學	說漢語的漢語文學	說漢語的非漢語文學

大陸學界	世界華文文學					華裔文學
	中國文學			華文文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臺灣文學	香港、澳門文學			

史書美	中國文學（排除在外）	華語語系文學	中國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	在地文學
王德威	中國文學（包括在外）	華語語系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
	最終的華語語系文學（廣義的中國文學）				

<sup>30</sup> 本表只為便於理解而進行的簡要劃分並非嚴謹。為了方便在中國文學部分只標注使用漢語創作的文學。關於華語語系文學部分的澳門文學以香港文學為準，因為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完全（幾乎）沒有提到過。

但是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與大陸學者之間存在着不能忽視的共同點或相似點。兩者都重視所謂漢語（華語）這一語言要素，執着於解釋華語語系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的關係。下面更具體地說一下。對於華語語系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所使用的語言是單一概念的漢語還是集合概念的漢語（華語），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等等，他們確實有不同意見。但是對於某種人類群體生活本身在文學的定義和範疇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他們都不太注意。他們唯一或首先考慮的只是所使用的語言——漢語（華語）而已。對於將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的關係要看作根與枝的關係還是要否定這種看法，在華語語系概念上應該包括中國還是排除中國等等，他們確實有不同意見。但是對於他們自身所設定範疇的文學（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華人華文文學）在世界文學或整個人類的層次上所具有的意義，他們都不太注意。他們主要只關注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的關係乃至中國與華人的關係而已。問題是不管他們各自的立場與意圖如何，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可能超越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或者作為歷史文化存在的中國，制造出一個作為巨大的新的想象的共同體的「大中華」。

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他們當初提出「華語語系」和「華語語系文學」，是為了解決華人所處的困境，也就是擺脫華人來自居住地與出發地的雙重支配或者雙重邊緣化，擺脫離散狀態而作為居住地成員的獲得文化身份認同。他們中有些人主張斷絕與中國的關係，另有些人主張利用中國的資源，這固然是事實，但即使如此這不是因為單純地重視與中國的關係本身，而是因為為了確立在居住地的地位。但是如果他們的論旨只局限在所謂中國向心力與華人離心力的關係網之中，那麼其結果就可能導出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承認。這樣與他們的原意或希望相反這卻可能使他們所反對的「中國中心主義」更加強化，同時也可能使來自居住地的壓力隨之更加增強。不僅如此，甚至他們所想象的共同體「華語語系群體」也可能與所謂中國的具

有彈性的歷史文化觀念、所謂中國大陸的強力的現實政治實體、所謂中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強烈的抽象理念相結合，結果為「大中國」或者「大中華」的誕生做出貢獻。

那麼大陸學界又怎樣呢？大陸學界也不能不警惕這一點。因為他們一直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霸權主義，但他們也卻有可能在朝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實際上近來大陸學界在中國文學範疇問題上比起國家境界或者政治地理，更趨向於強調語言文化要素。不管是「世界華文文學」主張的強化還是「漢語新文學」<sup>31</sup>主張的出現就是如此。他們全面提出華文／漢語這一語言的要素，挑戰既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觀念。這當然在指出大陸的學術體制與慣例的不合理性並試圖重新調整方面具有其意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就等於是試圖以漢語作為媒體，在再構中國文學範疇的同時要實現其範疇的最大化。當初從關心香港文學開始再到構建世界華文文學新領域的過程，把台灣、香港、澳門文學以及華人華文文學看作中國文學外部擴張的態度，對大陸內部少數種族文學或其他多種發聲的消極立場，提出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或者世界華文文學但實際上只重視與西方文學的對比等等，都在不知不覺中體現出這些面貌。<sup>32</sup>

<sup>31</sup> 澳門大學的朱壽桐等提出「漢語新文學」概念，通過《漢語新文學通史》等各種著述進行擴散。他主張：「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一切文學問題都可以而且應該回溯到語言層面。」見朱壽桐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頁10。「『漢語新文學』概念與其他概念相比較，其優勢正在於最大限度地超越乃至克服了國家板塊、政治地域對於新文學的某種規定和制約，從而使得新文學研究能夠擺脫政治化的學術預期，在漢語審美表達的規律性探討方面建構起新的學術路徑。」（頁8）但是他的這些主張與實踐至少存在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雖然在文學中語言是極為重要的要素，但他卻忽視文學從根本上是表現人類生活的藝術，只強調作為其表現手段的語言。第二，他的實際操作與其說是根據漢語文學的審美規律，不如說是單純包容所有使用漢語的文學，這不過是「一個中國」的大前提及「中國+漢族=新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潛在欲望表現在文學範疇上而已。

<sup>32</sup> 因此就連沈慶利這樣的大陸學者也對此進行批判。他的批判大概包括兩點：第一，世界華文文學的世界性理論背後包含着既貶低自我又誇大自我的中

從這些方面來看研究者有一件事必須要認識，這就是關於華人華文文學的意義與價值。華人華文文學不管是以何種方式都被包括在世界華文文學或者對抗它的華語語系文學的範疇之中。但是華人華文文學所具有的意義實際上已經超越這些層次。最重要的是華人華文文學雖然不完全是原封不動的德勒茲與瓜達利所說的少數文學，但是它仍然具有少數文學的價值，即它具有潛在力量給主流文學帶來衝擊，使文學本身變化發展。不僅如此，作為今天正在形成的跨國移居者文學的一部分，它就具有可能重塑世界文學的新地形。這一點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散在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群體（或者華人）從本質上說不是一元化的統一體，各個都是獨立的，多元的集合體。尤其是他們是屬於21世紀新形態的跨國移居者，而今天新形態的跨國移居者已經超越民族與民族國家，正在逐漸成為一種新型的人類群體。因此，華人文學（華人華文文學以及華人非華文文學）應該是超越中國與華人的層次，定位於全人類意義上的文學的一部分。<sup>33</sup>同樣的道理，關於華人華文文學的研究（或者與其有密切關係的華語語系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也不能只固執於探討有關它與中國的問題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華語語系文學的學者不能忽視既是他們自身已經提出的方案，又是大陸學者在批判他們的過程中提出的意見。要擺脫只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運用在探究與中國的關係上，也應該積極地適用在與居住地的關係以及與西方中心主義的關係上，尤其應該積極探討與跨國移居者文學的相關性。如果這樣，華語語系文學主張就可以作為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學界主流話語的批判理論，做出有意義的貢獻。不僅如此，他們可以作為活動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出身的學者，避免受到諸多誤會。即，他們可以避免以將自身的出身地作為素材而運用西

---

國與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第二，圍繞着中國文學中心的論爭背後也潛藏着中國大陸中心主義思想。見沈慶利，〈「世界華文文學」論爭之反思〉，陸卓寧主編，《和而不同》（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3-19。

<sup>33</sup> 關於華人華文文學更詳細的說明參考金惠俊，〈試論華人華文文學〉，《香港文學》第341期（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3），頁18-26。

方的理論，為西方中心主義助一臂之力的誤會。而且他們也可以多少避免代替西方牽制中國，或者保有以政治見解為基礎的冷戰思考等等的誤會。<sup>34</sup>

大陸學者更需要從根本上進行反思，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擺脫中國中心主義的觀點，從世界文學的層次重新探討中國文學與華人華文文學。對此應該包括以下幾點內容。第一，應該承認華人華文文學（或者更進一步包括大陸內部的少數種族文學）所具有的少數文學特征與價值。同時需要更加積極地探索華人華文文學所具有的跨國移居者文學的性質。第二，雖然有必要考察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或者華文文學／漢語文學的意義，但是這不能意味着要攻略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等西方文學的地位來取而代之。即，不管是中國文學還是華文文學／漢語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員其價值都應該得到承認，但是不能設定為將來取代西方文學的霸權存在。第三，將華人華文文學或者他們所主張的世界華文文學（實際上是大陸外部的華文文學），不能只看作是將中國故事向世界傳播的手段。<sup>35</sup>更重要的是，應該承認它是作為散在於世界各地的少數者的華人各自表現他們生活的藝術，通過這種方式來理解大陸內部少數者與大陸外部人類的生活並產生共鳴。就是說，對於中國文學，對內要承認內部的多種發聲，對外要努力獲得作為世界文

<sup>34</sup> 史書美在某次訪談中表明，自己的見解被評價為反中國的冷戰的態度這純粹是一種誤會。她說：「有人批判我挑起冷戰思維，……當中國雖然掛的是共產主義的名、而實際上非常資本主義時，……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了。……這是很大的一個誤解。但是在中國帽起的當中，它實際上在運用它的權力，怎樣誤用它的權力，這些我們也一定要批判……」。見許維賢、楊明惠，〈華語語系研究不只是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史書美訪談錄〉，《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3），頁173-189。

<sup>35</sup> 2016年11月在北京舉辦了「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中國海外交流協會、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主辦）。在開幕式和主旨發言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人士和中國作家協會的高層人士（吉狄馬加、葉辛）共同強調的有兩點，即中國迎來了「民族復興」和通過華文作家的作品向全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可是他們所謂的「中國故事」意指（發展中的）中國的情況，「世界」（實質上）意指西方。參加此次會議的有大陸學者100多人 and 大陸以外的華人作家200多人，還有少數像我這樣的外國學者。

學的一員的意義與價值；對於華人華文文學，要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承認華人華文文學既作為跨國移居者文學，又作為少數文學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

（梁楠譯）

## 主要徵引文獻

###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hu-mei Shih, "Introduction: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ain Bernar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13.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朴銀瓊，《韓國華僑的種族性》[韓語]，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

史書美，楊華慶譯，蔡建鑫校，《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沈慶利，〈「世界華文文學」論爭之反思〉，陸卓寧主編，《和而不同》，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3-19。

王德威，《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出版，2002。

王德威著，金惠俊譯，《現代中國小說22家》[韓語]，首爾：學古房，2014。

朱壽桐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崔承現，《華僑的歷史生存的歷史》[韓語]，仁川：火藥庫，2007。

### 二、期刊論文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19, No. 1, Jan. 2004, pp. 16-30.



Shu-mei Shih, "Hong Kong Literature as Sinophon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Vol. 8.2 & 9.1, Hong Kong: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at Lingnan University, Jan. 2008, pp. 11-20.

Shu-mei Shih, "Theory, Asia,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3, No. 4, Dec. 2010, pp. 465-484.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26, No. 3, May 2011, pp. 709-718.

王德威著，金惠俊譯，〈華語語系文學——邊緣的想象與跨際的構築〉[韓語]，《中國現代文學》第60號，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12，頁255-264。

郜元寶，〈「重畫」世界華語文學版圖——評王德威《當代小說二十家》〉，《文藝爭鳴》2007年第4期（2007.4），頁6-10。

金惠俊，〈試論華人華文文學〉[韓語]，《香港文學》第341期，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13，頁18-26。

金惠俊，〈華語語系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境界的解體或再確立〉[韓語]，《中國現代文學》第80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17，頁73-105。

金惠俊、梁楠，〈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初探〉，《中國語文論叢》第55輯，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2012，頁323-343。

金進，〈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疆界的必要和可能〉，《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5年第3期（2015.9），頁10-17。

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文藝研究》2015年第11期（2015.11），頁51-60。

李鳳亮，〈「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訪談錄〉，《花城》2008年第5期（2008.9），頁199-208。

李鳳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及其批評實踐——王德威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9.2），頁67-79。

- 李鳳亮、胡平，〈「華語語系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待解的問題〉，《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2013.1），頁53-61。
- 崔承現，〈現代「中國」與「華僑」的相互認識研究〉[韓語]，《中國學論叢》第33號，韓國中國文化學會，2011，頁285-306。
- 苗綠，〈重寫中國文學史——王德威教授訪談之一〉，《長城》2012年第7期（2012.7），頁170-174。
- 苗綠，〈中文語境裡的「世界公民」——王德威教授訪談之二〉，《長城》2012年第7期（2012.7），頁175-179。
- 彌沙，〈世界文學「觀念」與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5年第4期（2015.12），頁94-98。
-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芻議，或，《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翻譯專輯小引〉，《中外文學》第36卷第2期（2007.6），頁13-17。
- 史書美，〈理論·亞洲·華語語系〉，《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12），頁39-58。
- 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對台灣文學的可能意義〉，《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3），頁135-143。
- 史書美，〈何謂華語語系研究？〉，《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第9卷第2期（2016.6），頁105-123。
- 史書美，趙娟譯，〈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2011.12），頁5-14。
- 楊俊蕾，〈「中心—邊緣」雙夢記：海外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的流散、離散敘述〉，《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4期（2010.10），頁89-98。
- 吳奕錡、彭志恒、趙順宏、劉俊峰，〈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文藝報》華馨版（2002.2.26）。
- 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2007.3），頁110-118。
- 溫儒敏，〈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文藝爭鳴》2007年第7期（2007.7），頁51-55。

-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像與越界建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2006.9），頁1-4。
-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象：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12），頁11-38。
-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24期（2013.12），頁1-18。
- 王德威，〈華語語系，台灣觀點〉，《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3），頁131-134。
- 王德威，〈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華文文學》2014年第3期（2014.6），頁5-20。
-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38期（2015.1），頁1-29。
- 莊華興，〈馬華文學的疆界化與去疆界化：一個史的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12），頁93-106。
- 趙稀方，〈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文學〉，《北方論叢》2015年第2期（2015.3），頁31-35。
- 朱崇科，〈華語語系的話語建構及其問題〉，《學術研究》2010年第7期（2010.7），頁146-152、160。
- 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1期（2014.2），頁15-20。
- 曾軍，〈「華語語系學術」的生成及其問題〉，《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4期（2012.7），頁203-205。
- 曾琳，〈讀史書美「反離散」原文及中譯文有感〉，《華文文學》2014年第2期（2014.4），頁40-44。
- 陳慧樺，〈世界華文文學：實體還是迷思〉，《文訊》革新第52期（總91號）（1993.5），頁76-77。
- 湯擁華，〈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2期（2014.4），頁58-67。

- 畢紅霞，〈我們為何批評王德威——兼論面對「海外漢學」的複雜心態〉，  
《當代文壇》2013年第3期（2013.5），頁32-35。
- 許維賢、楊明惠，〈華語語系研究不只是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史書  
美訪談錄〉，《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3），頁173-189。
- 黃維梁，〈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福  
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2013.1），頁105-111。
- 黃一，〈書寫新的文學中國史——王德威教授訪談〉，《山花》2011年  
第15期（2011.8），頁138-143。

**Sinophone Literatur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Mainland Responses on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Discourse**

**KIM Hyejoon**

**Abstract**

In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have been keeping an ey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discourse, with some expressing more direct interest in it. Many mainland scholars find the notion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valuable in the way that it can potentially offer fresh academic vantage points, mobilize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ies, provide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develop convers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 beyond China, and mak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global literature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y often take much more critical stances toward the arguments produced from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discourse.

Most criticism is focused on the way Shu-mei Shih counterposes Sinophone communities (or overseas Chinese) with mainland China. Also, they argue against Shih's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ideas like 「against diaspora」, 「anti-Sino-centrism」,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Mainland scholars identify Shih's argument as a separatist one that sets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apart, essentially a vestige of Cold War ideology. Moreover, they do not limit their criticism to the argument itself, but extend to conditions of reasoning. They object that it is a case of simple application or misappropriation of postcolonial theory, minor literature theory, and other Western theories to the Chines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roblematics. Although these criticisms are justifiable, some of them are rather unnecessarily excessive.

Meanwhile, it is rarer to find mainland scholars making exclusively criticism against David Der-Wei Wang's argument and reasoning. The scarcity can probably be traced from the fact that Wang's argument has many overlaps with those of the mainland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way his argument highlight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need for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However, this does not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no criticisms against Wang's argument. In fact, mainland scholars challenge the way Wang translates the term 「Sinophone」 to 「Huayu Yuxi (華語語系)」. Also, they are wary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Wang comprehends the politics between mainland Chinese and the Sinophone community (which includes internally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other communities that do not align with PRC nationalism, and externally, the Taiwanese, Hong Kong, Macau, and Overseas Chinese) as domestically a repressive one and externally an imperial project.

Even when political stances are set aside, Sinophone literature scholars and mainland scholars hav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y view literature itself. The differences stand out most sharply in how they understand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and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literature, Macau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Mainland scholars tend to maintain the Sino-centric (or mainland-centric) perspectives, whereas those arguing for Sinophone literature understand Sinophone literature as an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sphere, which ultimately is unrelated or at least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with Chinese (or mainland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t might as well be said that such disagreement in how each define and categoriz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signifies the most revealing differences between Sinophone literature scholars and the mainstream mainland scholars.

Despite apparent disagreement, one must not overlook their commonalities or similarities. They both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linguistic element (Chinese/Hanyu/Huayu),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or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s relationship with mainland China.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stances or intention, this tendency can lead to

perhaps not the most desirable effect: they might end up producing an imagined community that exceeds China as political being or historical/cultural being, namely, 「the grand Sino-community」.

It is imperative that Sinophone literature scholars mak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both their own arguments and the insight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e mainland scholars' criticisms. That is, instead of confining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to examin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oncept can be mobilized to discuss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ce, Eurocentrism (Westcentrism), and most significantly, the transnational migrant literature. Only then the Sinophone literature as a critical theory can make crucial contribution to reshaping the Eurocentric tenor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conversation.

**Keywords:** Sinophone, Sinophon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and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